

# 两座岛、一群人： 新加坡金门社群的历史

文：江柏炜

## 作为侨乡的金门

金门(Quemoy),旧称浯洲、浯江等名,由金门岛、烈屿(小金门)等岛群所组成,坐落于台湾海峡西侧、福建厦门湾外,战略地位重要。近世以来,海外移民众多,跨境流动的社群促成各个层面的社会文化变迁。

有关金门人海外侨居的记载散见于地方史料,在鸦片战争之前,金门人已往来于东南亚、东北亚等城市。1842年《南京条约》后,厦门成为对外开放的城市,航路畅通、外商云集。此时,贫瘠岛屿上的金门人,看见了世界的变化,义无反顾地顺势南渡,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。

1949年以前,金门有四次主要的海外移民潮。首先是1860年《北京条约》开放华工出洋合法化,使得青壮人口大量赴海外谋生。第二次南渡潮在1912至1929年间,当时南洋相对于中国,商业发达、治安良好、往来便利,吸引青年出洋筑梦。第三次移民潮是1937-45年的日本军佔时期,青年逃至南洋投靠亲戚友人,当地俗称“走日本手”。第四次则是1945-49年间,因治安败坏、盗贼四起,加上国民政府自南方省县抽丁(征兵)调往北方支援国共战争,致使本地壮丁再次出洋。也就是说,前二次的侨居主要是经济因素,后二次的迁徙则为战乱与政治之故。

侨居地则遍及东南亚诸邦,如新加坡、马来半岛、北婆罗洲、印尼、菲律宾、越南、泰国、缅甸等地的主要港口城市,东北亚的日本长崎、神户也聚集了一部分的金门乡侨,香港也有。当然,许多案例是同乡陆续前往同一地点、从事同类工作、互助团结的“连锁式移民”(chain migration)模式。其中,海外金侨最为集中、人数最多的地方为新加坡。

## 新加坡金侨: 九八行商人与驳船业苦力

1819年,任英国苏门答腊明古连(Bencoolen)总督的莱佛士爵士(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)取得新加坡岛,1826年再与檳榔屿、马六甲合组海峡殖民地(Straits Settlements)。新加坡以重商主义的自由贸易政策,逐渐成为区域贸易的中心,并吸引了华

人(以闽、潮、广、琼、客五大帮群为主)、印度人移民到来。

研究发现,至少在1870年代,已有为数不少的金门人侨居新加坡。其中,一部分的商人于1876年正式建立“浯江孚济庙”(金门会馆前身),一部分的劳动者(又称估俚、苦力, coolies)则在新加坡河沿岸成立至少34个乡团,并合组“金浯江”(浯江公会前身)。这些乡团或会馆并没有留下完整的文献资料,昔日的运作机制需要仰赖口述历史加以复原。

在1870-1950年代之间,新加坡金门人主要集中于两种行业,一为从事跨境贸易的“九八行”,一为新加坡河上的驳船运输业。九八行基本上是一种批发土产货物、征收佣金代理的商号。由于佣金比例固定为2%，“结算货账,一律九八扣交,故名九八行”。土产主要由印尼群岛进口,多为树胶、锡米、胡椒、咖啡、红茶、丁香、豆蔻、黄豆、花生、辣椒干、亚蔘等,进入新加坡后,进行分装或简单加工,再卖给洋行。早期的九八行,不仅为经营者个人带来财富,更奠定了新加坡国际转口贸易的枢纽地位。

除了贸易商业之外,金门人还集中于驳船业(见图一,第234页)。新加坡的驳船业,分工极为细致,更有不同社群的地盘区隔。一般来说,同安人执大舫和摩哆舫的牛耳,活动范围是新加坡河内及直落亚逸(Telok Ayer)盆地的渡头,其次是潮州、惠安、金门人。华人的舫业,则多为晋江人所有,聚集在小坡美芝路海边及梧槽河、加冷河内。舫业及电船业则是金门人一枝独秀,地盘在老巴刹前的海边,后移至红灯码头一带。然而,金门人何时、为何在舫业称霸,因缺乏文献资料,目前没有确切的年代可证,但从口述访谈中,据信应在1870年代起已有不少人从事此一行业。对行业的垄断,是确保经济权益的一种手段,这种现象与连锁式移民模式有关,而且使得不同地缘帮群进入某一领域的地盘划分。这样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了解,为何在19世纪后期,新加坡沿岸出现了34个金门移民的驳船业估俚间之缘故。

除了上述两者外,还有一部分的金门移民从事木材产业、航运业、银行业、制造业等,素有成就,特别是1950-80年代,他们伴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崛起而成功致富,也是新加坡金门会馆及浯江公会的领导阶层,对新加坡的各领域发展,有卓越的贡献。

同时,在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中叶,金门文人南渡者,大有人在,如出身珠山、1937-48年间担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长的薛永黍(1889-1951);原籍后浦南门、长期担任华侨银行中文秘书、知名书法家的许允之(1890-1960);出生金门后浦、苦心经营南洋工商补习学校的林则杨(1888-1948)校长、陈国祥(1901-1980)校长;出身溪边、1948-1968年间继任新加坡南洋华侨中学校长的郑安仑(1910-1988);祖籍金门后浦、1939-1951年担任中华女中校长、1956年创办新加坡女子职业学校(1959年更名新加坡女子职业中学、1978年再更名为培道中学)的汪玉聪女士(1909-1983)等,对南洋侨教奉献心力。

### 跨境影响的新加坡金门乡贤

早期的第一代、第二代移民,之所以称为“华侨”,主要因为他们是一群身在海外,心系



家乡的移民。“侨”者，暂居也，华侨家庭是一种地理空间上散居、但经济、文化仍保持一种共同体凝聚的特殊家族型态。早期的移民，如果经济能力许可，他们的愿望是落叶归根。因此，他们总是在侨乡购置田地，建起一栋栋的大宅第或洋楼，修筑宗祠与祖坟。光宗耀祖、衣锦还乡是他们人生终极价值之实践。今天，金门岛上众多保存完整的近代侨村、传统合院及洋楼，成为重要的观光旅游资源，实拜早期华侨所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之赐。

不只是这样，早期的新加坡乡贤对金门的现代化，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。造桥铺路、创办学堂、补强治安、发展实业、改良政治、筹募赈灾等公益事业，均有华侨推动之痕迹。例如，今天金门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县治，即是新加坡金门孚济庙及金门公司（金门会馆前身）的努力。1913年总理黄安基（黄良檀哲嗣）、副总理陈芳岁暨侨商电呈福建巡按使许世英，“金门地方重要，恳设县治……”。1915年4月9日奉准，正式成立县治，设县知事。黄安基、陈芳岁等海外侨领对于家乡公共事务的关注，立下了极佳的典范，也使得后继者将金门的公益事业视为己任。

金门轮船公司的成立，又是另一个回馈乡里的感人故事。1922年，金门俱乐部致陈景兰、蔡嘉种、陈焕武公函，陈述金门交通不便。金门公司开会后决定组织金门轮船股份有限公司，发起入股，并拟定组织章程为：“第一条：本公司定名为金门轮船有限公司。第二条：本公司以经营金厦一带航业，及其他营业为目的。第三条：本公司设办事处于新加坡，及设事务所于厦门或金门。…第五条：本公司资本总额定四万元，分作四千股每股壹拾元，作一次收清。第六条：本公司股银以新加坡通用银元计算。…”。在四千股、每股十元、总额四万元叻币为目标下，获得多位乡侨的入股支持，如吴光桦认股一千元、陈芳窗七百五十元；陈景兰、吴继辇、蔡嘉种、陈芳岁、陈睿友、黄云钟、林春水等人叻币五百元；款项并由蔡嘉种、黄肖岩、陈景兰等人签收，资金存入当时的华侨银行。这些款项购置了一艘金星轮，川行金厦，办事处设于新加坡，同时设事务所及旅社部于厦门，让南洋归侨、返回侨居地的老侨、甫自家乡出发的新客，往来方便许多。

不过历史的现实是，一旦落叶归根成为无法实现的愿望，更多的情况是落地生根的现实。这个趋势，其实是移民的一种常态，新加坡华侨如此，马来西亚、汶莱、菲律宾、印尼、越南、日本等地亦然。他们在身分认同上也逐渐从华侨变成所谓的华人或华族（海外华人），也对新加坡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

我要强调的是，早期新加坡的乡贤，就是近代金门的乡贤。他们的跨境活动，在两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。因此，讨论他们的贡献，不能单独看一地的成就。新加坡与金门，即使现在分属两个政体，但是血缘、地缘的文化脐带从没有中断，就算是全球化的变迁如此快速，但我相信，只要文化的火苗不熄灭，金门永远是新加坡金门人的乡愁，新加坡也一直是金门的希望明灯。